

中共党史文集

(第三辑)

东北抗联历史学术问题讨论会专辑

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

说 明

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五日至九日在东北抗联老根据地——靖宇县召开了“东北抗联历史学术问题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抗联老战士、中共党史和地方党史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共九十余人。辽宁、黑龙江省部分党史研究工作者也应邀参加了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主要讨论了东北党和东北抗联的路线；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东北抗联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根据地；东北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以及东北义勇军和救国军等学术问题，和东北抗联烈士事迹的人物传记文章。会上共收到学术论文和烈士传记二十九篇，其中研究抗联史的学术论文十七篇，这些文章，作者从历史实际出发，试图探讨抗联历史中一些问题或提供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将其中部分文章汇集起来，编辑《中共党史文集》第三辑，暨“东北抗联历史学术问题讨论会专辑”供内部研究参考。由于水平所限，在编辑过程中，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请批评指正。

我们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曾经编辑过《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讨论文集》和《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报告会〈党史文集〉》，现在我们编辑《中共党史文集》第三辑暨“东北抗联历史学术问题讨论会专辑”，以后我们将使用《中共党史文集》的名称，继续编辑第四辑，第五辑……。

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

目 录

对满洲省委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的粗浅认识·····	贾 杰	(1)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综述·····	付长禄	(13)
抗联第一路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	严启祥	(21)
磐石游击队的建立和抗日斗争·····	孟东风	(31)
抗日民族英雄王德泰·····	任万举 霍燎原	(39)
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 ·····	王 瑛 严启祥 蒋颂贤 刘晓晖	(47)
试论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及失败的主要教训·····	李有清	(72)
试论王德林抗日救国军的兴衰·····	吕永华	(79)
试述党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方针与策略·····	李伟光	(85)
东北抗联和杨靖宇同志战斗生活片断 ·····	王戎华 刘俊臣 白玉斌 肖 伟	(90)
生的伟大 死的壮烈 ——也谈杨靖宇将军的牺牲·····	赵 贤 臧 儒	(98)
魏拯民同志住的“密营”和他的墓地·····	徐翰煊 褚庆福	(102)

对满洲省委所执行的政治 路线的粗浅认识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贾 杰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作和统一满洲党组织的领导，派陈为人同志到东北建立中国共产党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建立临时省委，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是党领导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末，是满洲省委领导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由反帝反封建革命转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阶段。

过去在研究东北地区这段党的历史时，很少涉及党的路线问题，林彪、“四人帮”一伙则大肆污蔑满洲省委是“叛徒集团”，把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誉。因此，现在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满洲省委的政治路线，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以便进一步研究东北党的历史问题。

(一)

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的满洲省委，主要是领导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关内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创造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东北，则是奉系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掠夺和血腥的统治，广大劳苦群众过着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悲惨生活。

为了加强和统一党的领导，完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一九二七年十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了陈为人同志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书记；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政纲”规定反对军阀投降卖国，“取消日本与张作霖所定的一个侵略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收回一切租界与日本所经营的铁路、矿山、航行以及其他重要产业”，“驱除日本军警出境”，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政纲”又规定，反对军阀的残酷统治，“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通信自由”；改善职工生活与劳动条

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按物价高涨增加工资”；彻底摧毁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财产”，“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从而建立一个“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中一切政权归革命委员会”的人民民主政权。“政纲”为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规定了具体任务。这是我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在东北的具体运用，为东北人民争取解放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两个决议”是依据东北工人、农民深受三重压迫的处境，为工农群众维护本身经济利益，争取政治权利以及从根本上摧毁军阀的反动统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进一步唤起工农群众的觉悟，推动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统治满洲的政治形势下，明确提出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为了完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满洲省委首先开展城市工作，在沈阳、大连、抚顺、哈尔滨等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开展工人运动。一方面组织工人建立各种组织，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要求人身自由和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在日本企业中提同工同酬和八小时工作制。在一般市民中，以反日同盟的形式组织青年学生起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满洲省委的城市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却助长了省委一些同志的“左”的思想情绪，并主张随时随地举行暴动。一九二八年二月召开的满洲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不仅没有纠正这种“左”倾情绪，反而完全接受并发展成为“左”倾盲动政策。一九二八年九月召开满洲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与听取了“六大”代表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完全同意“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认为满洲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

“满洲三大”纠正了第一次“左”倾路线错误，确定“党今后的路线及任务——整个满洲党的目前工作，是要建立党的基本工作与组织和取得广大群众准备着全国革命高潮到来时决定我们武装暴动。”但是，“满洲三大”和“六大”一样，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在此以后，农村工作仍然没有很好开展起来。

在满洲“三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出现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临江设领”^①与“吉会筑路”^②的斗争以及一九二九年反对奉系军阀劫夺“中东路”^③的斗争。满洲省委在这些斗争中，都正确的贯彻执行了党的政治路线，扩大了党的影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中东路工人罢工，为工人斗争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并以中东路事件为中心推动了北满各种群众斗争，造成了当时满洲工人运动的大好形势，给日寇和反动军阀以严重打击。因此，在中东路事件后，广大群众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在哈尔滨就出现了多次工人罢工和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实际行动反对了军阀抢夺中东路的斗争。

刘少奇同志在领导中东路斗争中，始终是同广大工人站在一起的，在对敌斗争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林彪、“四人帮”硬给刘少奇同志头上强加的三帽之一是“叛徒”，而根据之一又是硬说他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纱厂被捕后“叛变”，说他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省委的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且

向敌人“积极出谋献策”，因而被释放。还说，由于他提供情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甚至按照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进行反苏反共”等等。刘少奇同志于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纱厂被捕和被关押监狱，确有其事，但是，少奇同志被捕时是用的假名，更没有暴露政治身份，终因证据不足，就取保释放了，释放时在发给少奇同志一份“高等检查厅裁决书”中写着：“检查却下，不起诉处分”九个字。这显然是因证据不足释放的，无丝毫变节情况，更不是什么投敌叛变。同时，少奇同志被释放后仍留满洲省委继续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据当时在满洲省委任组织干事的杨一辰同志证实：少奇同志被捕，没有影响到党的组织和机密；党的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学校工厂支部没有一个遭破坏，也没有一个同志受牵连被捕。这是历史的真象，林彪“四人帮”一伙，人妖颠倒、黑白不分、是非混淆、栽赃陷害，诬蔑刘少奇同志，歪曲党的光荣斗争历史，居心险恶，国法难容。

由于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城镇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和造成了工人运动大好形势的影响，因此，在中东路事件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也逐渐发展到农村。满洲省委为加强对东北地区广大农村的农民运动的领导，于一九三〇年五月颁布了“满洲农民斗争纲领”。“纲领”提出：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不出捐，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富农土地分给农民，驱逐土豪劣绅，根本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以及武装农民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七月省委又和全总满洲办事处联合发表了“告全满劳苦农民书”。“纲领”和“告农民书”都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领导农民开展斗争。此后，东北地区农民革命运动出现了极其活跃的局面，推动了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吉林省延边地区党组织接到省委指示后，便立即发动和领导了延边各农村数以百计的工人罢工、农民罢耕、学生罢课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又发动了大规模的“五卅”暴动^④和“八一”额穆暴动^⑤。这两个暴动声势极大，参加暴动的武装群众袭击日寇及其走狗机关，收缴军警武器，破坏交通沿线，烧毁官豪宅院，打杀土劣走狗，其势异常猛烈，使反动军警猝不及防。农民暴动后成立了苏维埃临时组织，散发宣言传单，分配没收的粮食和财物，农民上山进行游击战争。

在满洲省委坚持正确路线，领导东北地区广大工农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地主的斗争高潮时，在党内出现了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在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形成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在全国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并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其口号是：“暴动、暴动、再暴动”，“进攻、进攻、再进攻。”

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央“六、一一”决议案传达后，很快就接受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并于九月向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发出了“满洲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与工作路线”决议案。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夜”，满洲“完全是迫近革

命高潮，伟大的革命波涛，更加迫近的形势”，要求各地党组织举行“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组织秋收起义”、“进行土地革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党坚决的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口号，组织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士兵暴动，建立红军，并号召红军积极进攻，以有力地配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满洲省委制定和布置了一系列“左”倾计划，并将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立准备暴动的“总行动委员会”，中央派孙杰（陈潭秋）同志为书记，并在南、东、北满及中心城市分别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党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东满、南满各级党、团都停止了日常工作，都布置“左”倾的地方暴动计划。如中共延和县委确定延边地方暴动为党的中心任务，并决定发动农村秋收暴动、组织天图路、龙井村工人同盟罢工、策动局子街、大砬子、飞声砬子、蛤蟆塘的兵变，以及普遍发动游击战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柳河县党组织决定地方暴动为全县工作的总方向；磐石、清源县也通过了组织地方暴动的决议；朝阳镇（今辉南）没有一个党员，也要在那里布置暴动。在当时有的党员甚至认为“暴动期间用不着秘密工作，”只要蛮干、硬拚就行。因此，省委提出的贯彻立三路线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在工作上也必然造成严重的损失。

第二次“左”倾路线或者根本行不通，或者勉强组织起来也很快地遭到了失败。这是因为首先在城市由于革命主观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只是以政治口号去号召工人暴动、总同盟罢工，不从根本上发动工人群众日常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其结果是只能缩小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削弱城市工作。其次，在农村中也是空喊地方暴动，也不从根本上去发动与组织农民开展日常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进行农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其结果是多数农村的暴动计划没能实现，使组织农民群众的工作和已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都陷于停顿状态。因此，虽然广大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在斗争中都表现出英勇顽强的精神和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但是在敌人极端野蛮和残暴的镇压下，暴动群众都受到了惨重的打击，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东北全区党员数量由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二千余人，到一九三一年初就锐减为一千二百人，其中东满地区由一千二百人降为六百三十人，可见，立三路线给东北地区党组织和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中央三中全会决议，批评了省委在执行立三路线时期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放弃了原来的暴动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与经常工作。同时将“总行动委员会”改为满洲省委，孙杰同志继续任书记。从此，满洲党的工作在孙杰同志领导和积极推动下，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不仅使遭到了破坏的奉天市委，北满地委、延吉，磐石、柳河、清原县委，抚顺、台安、大连、长春特支等十多个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恢复，而且又发展建立了四十三个新的地方组织。党员又增到二千余名，并有一万五千多名工农群众加入了党领导的各种革命团体。在各方面工作初步恢复的基础上，省委又在十一月召开扩大会议和三一年一月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反立三路线的紧急通知”，又进一步批评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扩大会议”和“通知”仍然对立三路线有调和的情绪，认为过去执行立三路线只是犯了“个别策略”的错误，满洲仍是“高潮的形势”，会议规定“为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政治任务。”因此，无论十一月扩大会议或以后发的文

件，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致使长期遗留下来若干的“左”倾思想和政策还浓厚的存在着。到三一年二月，省委作出“接受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后，又接受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给东北党的影响更深，造成的损失更大。

综上所述，满洲省委从一九二七年建立时就受第一次“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在“满洲三大”纠正这一错误后，坚持正确路线，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就迅速向前发展；相反，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开始贯彻李立三第二次“左”倾路线，组织“总行动委员会”到处搞暴动，使满洲党组织和革命运动又遭受严重挫折。

(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末的满洲省委，主要是领导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由反帝反封建转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占领沈阳的事变，从此，我东北地区迅速地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要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野蛮的、残暴的殖民统治，使“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成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中日矛盾变动了中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⑧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东北，阶级关系开始了新的组合，这就是不仅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资产阶级以至除少数汗奸败类之外的军阀、地主，甚至土匪，也由于他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打击所造成的矛盾要求起来抗日。这样，就使原来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人民革命斗争，在实际上变为主要锋芒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实际上开始转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新阶段，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在九月廿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强调指出了日寇侵略东北的目的是侵略中国，并为进攻苏联作准备。中国人民、东北人民的民族灾难是南京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投降政策带来的，不能寄予任何幻想。号召人民群众和武装军队，自己起来救国自救，组织民众政府，自动抵抗日寇进攻，才是唯一的出路。满洲省委在没有接到中央的宣言之前，于九月十九日首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廿日又发表了“告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动群众书”，廿一日又做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在“宣言”和“决议”中，向东北人民揭露了日寇侵占沈阳的真象和原因及国民党长期卖国政策；号召“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九月，中共中央又指出：

“加紧在满洲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因此，面对“九一八”事变

后的新形势、新变化，以及党中央所发表的抗日宣言和主张，满洲党的政治路线应是：联合一切抗日势力和武装力量，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党的号召和发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而直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灾难的东北人民则更是如火如荼的勇敢的与日寇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黑龙江省的马占山和苏炳文旧军、吉林省的丁超和李杜以及冯占海旧军，辽宁的唐聚五和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还有吉东的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等救国军奋起抗日。但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远大的革命目标，因此，很快就被日寇关东军的武力镇压、政治分化、特务拉拢，各个击破，全部摧垮。然而，就在以旧军队为主体的初期抗日斗争中，满洲省委就密切注视着因日寇武装侵略东北所引起的民族危机和广大群众反日斗争高潮的形势。在初期抗日斗争中，省委是坚持不渝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路线，清醒地认识到满洲党必须争取旧的统治者，用合法合作的形式配合秘密工作，积极参加各地起义，领导与组织那些自发的抗日运动，扩大党在抗日武装队伍中的影响，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加强党所直接领导的红色游击队。为实现此目的，党曾积极加强和发展了地方的群众组织“反日会”，派干部和动员工农分子、知识分子参加“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等。主要方法是参加上层和打入下层齐头并进，如王德林部队起义组织救国军时，东满特委就派党员胡泽民、王生柏等十多名同志参加鼓动与计划起义工作。省委直接派杨靖宇同志到南满吉海铁路沿线指导游击队运动和组织南满游击队；派周保中同志到吉东，集中全力在“自卫军”和“救国军”中进行活动，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队伍；派冯仲云同志到松花江下游组织汤原游击队；动员青年干部、工人和学生打入伪警备军各旅，进行秘密工作，瓦解走狗军，促其起义，转向抗日，携武器参加红色游击队。在此期间，中共北方局还派李兆麟和孙乙太二同志到东北义勇军中工作。满洲省委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发表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性斗争创造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因此，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在磐石、海龙、延边、宁安、穆稜、密山、饶河、汤原等县都组织起人民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虽然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限制，几经破坏，但是他们都能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寇军，并在斗争中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

然而，就在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进入抗日斗争中，却又遭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形成了一条更加系统、完整、更有“理论”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路线，在全党流毒极深，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极大。而三次“左”倾路线对满洲党危害最严重的是表现在党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在东北的贯彻和执行上。一九三二年六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直、鲁、豫、陕、满洲等五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会上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的决议”。这是三次“左”倾路线在北方党（包括东北党）的工作中的继续贯彻和发挥。决议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九一八”后东北的

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及变化，做了错误的分析和论断，主观认为“全国阶级力量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方面的”；在谈到“九一八”后各阶级关系时，仍旧提出无区别的“左”倾的“打倒一切”的观点。北方会议抹杀东北的特殊性，完全忽视了东北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和由此而引起的阶级关系变化的事实，而强调提出“反对北方‘特殊论’与北方‘例外论’”认为革命危机在东北和关内同样存在。因此，就过早的提出“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和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

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了北方会议所规定“左”倾路线。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接受中共北方会议的决议”和“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告同志书——展开两条路线斗争，为创建满洲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两个文件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后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中强调指出：“省委扩大会议是扩大了北方会议在满洲‘左’的路线，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洲党组织与群众没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及苏维埃运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现阶段上阶级力量相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形。”因此，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扩大了北方会议在满洲的“左”倾路线的表现。满洲党在贯彻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十人五十人的游击队，统统要求建立红军（如磐石、海龙、巴彦、东满）；认为工农义勇军的活动就是红军游击区域，要立刻开始建立苏维埃与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土地（如东满、磐石）；在荒无人烟的汤原也要建立苏维埃区域，在汤原反日军中二个三个五个人也要华变出来，建立自己的工农义勇军或者红军游击队。因此，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以致阻碍党的工作在有利的条件下不能顺利的开展，或者有的已在反日队伍中建立了党的工作也遭到了失败。如唐聚五九路军的溃败。巴彦游击队的解体，珠河游击队的失败，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同时也“抹杀了满洲三十万武装反日游击队的伟大力量”，没有很好的组织和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范围，而一味空喊“武装保卫苏联”。可见，满洲省委由于执行北方会议所规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未能及时把广大的抗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相反却使党在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中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满洲省委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和有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牺牲了一同志，但是就整个斗争环境来说，日寇进占满洲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民族自觉、群众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立场；同时也更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的卖国投降面貌。因此，革命士兵、工人、农民、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都起来积极抗日，坚决消灭日寇的情绪更加高涨；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是直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痛苦，迫切要求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可见。在初期抗日游击战争中，虽然是国民党、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以及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干扰，但是，无论是满洲省委，还是大多数基层党组织，也无论是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的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抗日情绪是日益高涨的。因此，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是迅速向高潮方向发展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对于满洲党的政治路线、战略与策略的转变和对指导

满洲的抗日游击运动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满洲省委在过去指导东北工作时，在实际上是执行全国一致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方针”。中央还没有把满洲所处的具体环境——即日寇已首先实行武装占领与内地的一般情况区别开来；没有把中国革命总的方向与个别地方的不同特点区别开来。“一·二六”指示信指出：日本要独占满洲，想把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准备反苏，引起帝国主义瓜分战争。并在对东北政治形势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明确的指出满洲党必须在抗日各阶级中“组织抗日全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广大群众，在斗争中建立和巩固党的领导权。同时要在东北现有四种武装力量中进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逐步扩大党所领导的武装，以至建立起人民革命军，推动整个满洲抗日游击战争向着更高潮方向发展，形成广泛的人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

满洲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党对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为此，于同年五月十五日，省委又做出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决议，即“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这是满洲省委在新形势下转变策略路线的开始。七月一日作出“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认识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九月十五日又发表“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论全民族反日反帝的统一战线”。在这一系列文件中提出了党在满洲的基本任务是：“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夺取和巩固在反日游击运动和整个革命中的领导权”、“建立满洲的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并在这个斗争中来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

根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满洲省委改变了过“左”的关门主义的口号。如把“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一切卖国贼财产为抗日战费和救济贫民”的口号；对伪军则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以代替过去骂他为“亡国奴”的口号。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把愿意抗日的人们都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尤其是建立和发展游击区农协工作。这一新路线的贯彻执行，把大批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至开明绅士和地主都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了，形成了一个“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二六”指示信要求把党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变成吸引团结一切武装力量的核心。“一·二六”指示信是一九三三年春夏季传到东北的，当时正是第一种军队吉林自卫军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完全处于崩溃状态；第二种军队救国军处于半崩溃状态；第三种军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军等处于游离状态；第四种军队党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处于萌芽发展状态。对于这些各种不同色彩的人民武装力量，党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方针，把他们团结起来、统一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当时，对于原来由东北军组成的抗日义勇军，则批评和揭露其上层的动摇，克服其受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影响，争取其下级军官尤其是争取广大士兵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对于自发的农民队伍，如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则破除迷信，孤立其胡匪头目，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对于我党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则派进了大批工人、农民、学生，使赤色游击队迅速成长和壮大起来，成为吸引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满洲省委为了团结和统一各种

抗日武装力量，输送大批力量到赤色游击队中去，并于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两周年时把赤色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军。在磐石，由杨靖宇同志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珠河，由赵尚志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朝阳部队改编的）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吉东，由周保中同志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此外，在虎林、饶河等地由李延录等同志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和下江汤原等地的各色游击队也相继改成其他各军。这是贯彻党中央新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收获，从而推动了整个满洲抗日游击战争向更高潮方向发展，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

从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贯彻以后，整个东北人民革命军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发展和壮大，他们战斗在长白山下、鸭绿江边，不断打击日寇的侵犯；他们出没在大兴安岭间、龙江平原，和日寇军顽强作战；他们活跃在东北部分铁路沿线、松江两岸，同日寇浴血奋战，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布满了抗联“铁骑”，纵横不断地进攻和袭击日寇军，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高潮。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号召和发动，在东北迅速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在南满、东满、北满组织起人民游击队打击日寇军，并在斗争中不断获得巩固和发展。但是，正当满洲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轰轰烈烈地抗日斗争时，在一九三二年七月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又开始贯彻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抗日战争又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后，满洲省委在新形势下转变了战略策略，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正个满洲抗日游击战争向更高潮方向发展，形成了广泛的人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

（三）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末中共满洲省委撤销这一时期内，在我们党内曾发生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这三次“左”倾路线对满洲党组织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满洲省委在一些工作中走上了“左”倾的、“盲动”的、“空喊”的、“大干”的严重错误。然而，这些错误始终没有离开党中央的总路线——“在革命危机加深，革命新高涨的形势下，争取广大群众，组织政治罢工以及总同盟罢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路线。”总的目的是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纲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大方向是对的，在实际工作中虽然是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但这是在贯彻执行党中央错误路线中发生的严重的路线错误，而不是省委本身离开中央路线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

对于满洲省委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过程应做具体分析，因为路线问题是不可能所有的时间内和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的或者都是错误的。从满洲省委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历程来看，凡能根据东北实际情况规定党的任务、路线，发动和领导东北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党就向前发展，革命就胜利和出现新高潮；凡是贯彻“左”倾路线，党就受挫折，革命就受损失和出现低潮。特别是在克服和纠正“左”倾路线干扰和破坏，党和革命都顺利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出现新高潮。然而，现在总结满洲省这段历史时，主

要侧重总结一下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央错误路线中犯错误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因此，我认为满洲省委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满洲省委没有认清东北同关内有不同的特点。一是，满洲省委没有认识东北没有象长江流域一带经过了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群众运动，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锻炼；而东北是日本和奉系军阀统治着，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锻炼，因此，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关内人民群众的觉悟是不同的。二是，满洲只是处于全国苏维埃土地革命阶段，地主阶级较顽固的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象上海和南方等地参加过革命斗争，同买办资产阶级有矛盾；而东北仅有一点民族工业还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同买办资产阶级还没有发生直接矛盾。三是，满洲是日本垄断的势力范围，虽然过去英美都曾争夺过，但却没有什么地位，民族矛盾的焦点是日本。这点还认识不清。四是，党的主观力量不够强大，党的组织还很薄弱，当时在满洲只有中共党员三、四百人，党组织和党员的大多数没有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锻炼，因此，是难以把东北苏维埃土地革命一下子开展起来的。

其次，在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中，缺乏有区别、有步骤地来争取群众，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满洲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中，就曾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对的，但是应有所区别，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奉系军阀放在首位，就更有策略和有利于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口号在土地革命中提出也是对的。但在满洲的具体情况下也是有问题的。

“反对日本一切苛捐杂税”是对的，但是“杀尽一切日本官吏、土豪劣绅与资本家，政治权力归农协代表会议”这个提法对于分化敌人上是不策略的。在农村发动农民，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抗日游击队也是对的，但是不顾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与可能性，到处搞飞行集会，到处搞暴动，成立所谓苏维埃和红军，结果使党遭受破坏，抗日武装没有很好的发展，这就不对了。

再次，忽视客观条件，对主观力量估计不足。满洲省委在过去不顾客观条件的抚顺暴动计划，忽视主观力量的北宁路政治罢工的布置，没有工农斗争相配合的某部队士兵暴动的决定，以及东、北、南满刚开始的游击战争向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的指示，这显然都是错误的。而这些错误又影响到地方党组织，吉林县委幻想在一个月内夺取省政府，南满秘密暴动想一步登天的大干，各县不顾客观力量就要召开联席会议等等。总之，中国革命处于苏维埃土地革命时期，在满洲也无例外的完成同期的革命任务是对的，但是应在满洲的具体环境下，有区别有步骤的逐步来作，才能更好的完成满洲的革命任务。满洲党没有这样做，结果在实际工作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满洲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在客观上是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而党中央出现三次“左”倾路线又是与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有多方面的联系。三次“左”倾路线的出现和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在许多问题上也都是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分不开的，瞿秋白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占据党中央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就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和“武装暴动”，而瞿秋白就追随罗明纳兹，提出在全国都搞武装暴

动夺取政权，后来，当这种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武装暴动造成危害时，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批评了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李立三第二次“左”倾路线占据党中央时，共产国际派赴中国的代表少了，有的不起作用。但是，一九二八年时共产国际就认为十月革命的形势又要出现，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后又要求中共“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〇年六月，莫洛托夫在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说：“中国苏维埃能够夺取中心城市，形成工农苏维埃政府。”因此，虽然立三路线时期没有驻中国代表一道工作。但是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是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更加向“左”发展是有关系的。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同共产国际政治上的“左”倾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搞起来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米夫支持下召开的，会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是米夫起草的，因此，形成了一条更加系统、完正和更有“理论”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在四中全会夺取党的领导权以后，他懂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要性，于是王明、康生又取代了瞿秋白等人驻共产国际的职务。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从上海迁到苏区，中共满洲省委和党中央失掉联系，此后，满洲省委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了。代表团经常以“国际”和“中央”名义发指示，并在海参崴设立代表团机关，还有联络员来往满洲。满洲党组织贯彻代表团指示，对满洲省委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有重要影响。因此，党中央出现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固然在主观上是党还处在幼年，政治上不成熟。教条主义所造成的，但是也绝对不能忽视在客观上是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所犯“左”倾路线错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满洲省委的政治路线。如果说党中央出现的三次“左”倾路线有主客观原因，而满洲省委在贯彻执行三次“左”倾路线中出现的错误，也同样有其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党的地方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满洲省委是坚持领导东北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日寇，前仆后继，顽强战斗，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北的决心，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高潮。

综上所述，满洲省委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方针、路线中所造成的错误，只能说是执行三次“左”倾路线中出现的严重的路线错误，不能说是满洲省委自身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

注：

① 拒日“临江设领”。是一九二七年春日寇蔑我主权，强行在临江设置领事，临江人民群起反对，组织抗日请愿，工农商学一律罢业，全体万余人游行示威，拆毁日寇强租做领事馆的五间民房，赶跑了田中作。

② 反对“吉会筑路”，是一九二八年日寇再次要求延长吉敦铁路，以期完成吉会路全线而达到朝鲜的清津港的目的。十月九日，奉天交通委员会核准了吉长、吉敦路借款，允许日寇延长吉敦铁路，东北爆发了反日保路运动。

③ 反对军阀劫夺“中东路”，是东北奉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一九二九年以武力强行霸占中东路，暴发了中东路工人大罢工。

④ “五卅”暴动，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卅日夜，在延边党组织发动与组织延边广大工农群众奋起袭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机关，袭击封建军阀政府和地主土豪宅院，没收地主粮食和焚毁地主高利贷契约租券等大规模的农民斗争。

⑤ “八一”额穆暴动，是在“五卅”暴动影响下的一次大规模农民暴动。这次暴动是以敦、额两县为中心，波及到吉、敦铁路沿线各县及北满宁安一带广大地区农民群众包围驻军防所、收缴军警武器，破坏交通电线，烧毁富豪家宅，打杀土劣走狗的其势异常猛烈的农民斗争。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25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38 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43 页）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综述

吉林大学历史系 付长禄

历时十四年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整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创建并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主力军。东北抗联的产生和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除了其他一些因素外，是同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分不开的。值得提出的是，我党在东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于全国数年。尽管在奋斗中也经历了失利和挫折，然而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就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政策演变、特点及意义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在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上称为反日统一战线，也称为抗日反“满”统一战线。它是在我党领导下，以东北抗联（初期是赤色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为中心的阶层十分广泛的抗日共同阵线。它除有广大工人、农民作基础外，还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和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抗日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阶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由于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南京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大片富饶土地旋即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东北各族同胞陷于殖民地的深渊之中。

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吞，在东北，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种阶级矛盾相对下降，收复失地、抗日救亡，成为除汉奸卖国贼之外各阶级、阶层、派别的普遍要求。

在侵略者穷兵黩武、烧杀淫掠面前，历来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广大东北工人、农民受害最深。他们面临失业、饥饿和死亡的严重威胁。据统计，仅因水灾和战争而受害的饥民难民，便多达八百万至一千万人，占东北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我党的号召下，他们坚决要求抗日，纷纷举行罢工和暴动。据安福特洛夫的《满洲游击队的潜在活动》一书记载：一九三二年东北城市曾经发生了十次大罢工，参加的人数在一万八千以上；一九三三年罢工次数增至十八次，参加人数在二万五千以上；一九三四年罢工次数则超过了二十次。^①同年春在黑龙江省伊兰县土龙山，爆发了上万农民参加的武装反日大暴动。同时，成批的工人、农民投入抗日军的行动。濒临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也别无生路，

只有起而反抗。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东北，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东北有产阶级也身受其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地主，由于他们受排挤、打击，资本和土地被剥削夺，而孕育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情绪，直接或间接地同情、赞助反满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扭转危机，竭力把浩繁的战费和财经负担，转嫁给东北同胞。某驻伪满情报处长直言不讳地供认：“我们负担不起占领满洲的费用，所以我们总要设法使满洲的中国人偿付全部账单，……间接的强迫有钱的中国人吐出一大部财产来。”^②事实正是如此。他们完全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地掠夺资金和资源，垄断贸易和市场，使民族工商业横遭摧残。譬如，“九一八”事变前，曾因东北的中国自营铁路改用国产的煤炭，刺激了民族采煤业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满铁”——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大本营——的经济扩张。但是，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劫收东北铁路为“国有”，一度处于“四面楚歌”的满铁“社炭”转为“需要激增”，以至充斥了东北市场。^③实际上，东北的工业交通，大自机车制造，小至火柴生产，统统置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同时他们还先封闭东北的金融机构，续而合并为所谓“满洲中央银行”，一切业务，概由日人监督。一九三二年实行“币制改革”，取缔奉票、官帖，并用新发伪币以很大折扣收回，使东北民众、尤其是工商业者蒙受相当大的损失。

在农村，一部分地主也面临着日本侵略者武装移民、强行并村的威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东北移民，强行低价收买以至无偿侵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事变前一亩土地价值五十至二百元，事变后，他们则以熟地二十八元、荒地三元的廉价征收。^④据载，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被日本侵略者强占的土地达十八万顷之多。为了限制抗日义勇军活动，他们除强行收缴民间武器外，还并村并屯，“致使无地耕作，流离失所，哀鸿载道；畴昔富有，变为饿殍。”^⑤于是，一部分地主也不满日伪统治，有些人还直接参加到抗日反满斗争中来。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曾拥有三十万之众的各类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战初期，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是中日民族矛盾在东北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抗日义勇军中除了我党直接领导的赤色反日游击队外，还有“山林队”，有大刀会、红枪会，也有违抗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留在东北境内的原东北军的抗日部队，如黑龙江马占山、苏炳文部，吉林省李杜、冯占海等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辽宁省唐聚五的“民众救国军”等。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曾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抗日义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综上所述，“九一八”后的东北，“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⑥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成为东北民众的一致愿望，共同使命。这就为结成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渐从“左”倾路线影响下解脱出来，走上正确轨道的过程。